

杨红回忆杨之光： 父亲留下的精神财富让我们终身受用

我对自己父亲有新的认识,是在五年前的杨之光先生告别会上。记得那天上千人前来送行,除了众多学生、亲朋好友、社会各界人士及各级相关领导,还有不少拄着拐杖行动不便的老同事,最让我感动与意外的是,就连之前为父亲提供过服务的水电工、送煤气工、木工、装裱工……也都来现场默默为父亲送行。我终于明白,除了父亲一生不平凡的艺术贡献与人生历程之外,最为人称颂的,是他的为人。

父亲一直有一种回报国家的情怀,他一直很重视自己的所有作品,乃至草稿,总感觉他早就预想着有一天,国家是需要这些的。他一直把自己所有产出的作品,视为“公有”。在他看来,他能有这些作品,都是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一旦国家和人民对他的作品认可,要提出收藏的时候,他会认为这才是最好的归宿。

因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期,他就陆续将他的毕生心血逾1200幅作品,捐献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学院等。

作为老师,他最爱护自己的学生,最重视教学系统与质量,最强调中西贯通的开放学术态度。他从不为自己谋利益,却常常为美术学院的青年教师奔走,为年轻人解决各种困难。至今,广州美院还留着一栋上世纪80年代初建造的小楼,是当年由我父亲找来他在香港的企业家好友,专门为无法解决住房问题的年轻教师建造的,取名为“德艺楼”,牌匾由父亲亲笔题字,悬挂至今。

作为父亲,他从未想过要把作品留给子女,他的理由很简单:我这些作品来自于人民,应归还于人民。

他经常以言传身教来影响子孙后代。他总说,一个人



■杨之光与杨红

不要太计较,要舍得付出;不要怕困难,困境可以锻炼人。因此,当有人问我“你父亲捐出的作品,现市价近两个亿了,你不感到很亏么?”这类问题时,我是很坦然的。因为我仍觉得自己很富有;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笔无法估量的精神财富,我和我的孩子都将终身受用。

(受访者口述,梁志钦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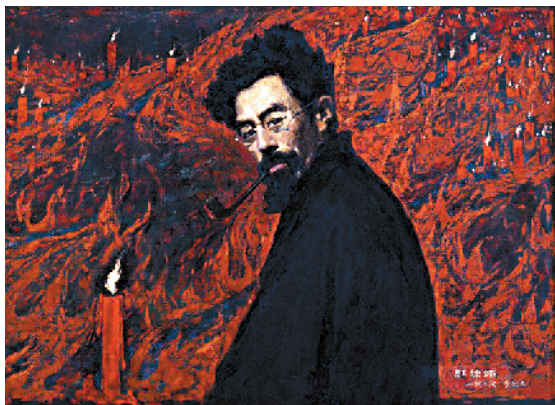
■德艺楼 杨之光题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回忆闻一多： 他的品格人性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

《红烛颂》这件作品曾经多次展出,特殊时间更能显示出特殊意义。这件作品表达了我对父亲闻一多的崇敬与缅怀之情,对我来说,闻一多既是父亲又是英雄。我的人生和艺术旅程受父亲影响极大,尤其是成年懂事以后,他的品格人性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在开始学画之初就下决心将来一定要画好父亲。

从20世纪50年代我开始画父亲,但是最终选择红烛作为表达的载体,是因为以闻一多为原型的《红烛》电影摄制组的一次采访,在采访中我忽然感到,其实父亲的精神就是《红烛》这首诗的精神,也正是我作品中要表达的精神。后来,在青海的一次写生中,我发现烛的燃烧与流淌就像革命者的生涯一样有意味,于是进一步确定了以蜡烛这种形式来衬托画面中人物的品格,在烛光变为红旗的过程中,人物精神得到体现。在作品的创作中,我始终被情感所包围,就像一种原始冲动的激荡贯穿在创作的始末,这与一般历史题材的创作有所不同,因为那是我真实情感的流露。今天再读这件作品,使我再一次认识了闻一多的伟大人生,也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发展的过程,展览同时提供一个契机,让我的个人记忆与当下感受再次融合。

在我的记忆中,党就是我的亲人。在父亲去世后最艰苦的日子里,是党给了我们照顾与关怀。因此,我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对党、对革命烈士的崇拜与感激之情。拿我创作的《国际歌》这件作品来说,它是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生班的毕业创作,我试图改变以往在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中常用的平视视角和非常细节化的情节安排,以大的仰视视角,把人物塑造成纪念碑式的形象,由此体现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也突出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心。在当时大学生的印象



■闻立鹏《红烛颂》

里,国际主义是一种振奋人心的、严肃的终极远望,因此,在这件作品中,我选择了用一种深沉的色调表现画面凝重的整体氛围,希望能够通过作品唤起人们对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的希望和信心。画面仰视视角的灵感来源于我参观黄山立马峰巨石壁时的感受,当我仰视巨大的岩石时,那种对自然的崇敬油然而生,这不正是我对革命烈士要表达的崇敬之心么!画面背景上红色的天空则是我在临摹敦煌壁画时受到的启发,红色是革命的颜色。可以说,这件作品是一种与我当时的生活和所处环境紧密相关的情感外化。当时很多创作反映的都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真切的情感,画家希望用壮美的语言来表达内心对革命、对党的咏怀。

(据《中国艺术报》)

潘奋回忆潘鹤： 感激父亲的“放养” 让我很自立



■潘奋与父亲潘鹤

我一直觉得父亲做老师是很适合的,他对自己的学生非常好,尽心尽力,他的学生平均都收到过几十封他写的信,有些甚至是几百封。很多他的得意门生都被他当作儿子看待。

但作为儿子,我觉得他这位老爸是挺“不合格”的,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生只给我写过不超过三封信,他对我基本是放养的态度,印象中从来没有在具体的教育和生活方面认真地“教”我们,因此,美院毕业后,我先是找到了一份建筑设计师工作做了五年,辞职后又自己开公司从事景观设计装修设计等工作,工作之余倒一直没有耽误过做父亲的义务助手这个角色,还义务为广州美术学院筹建潘鹤雕塑园,三十年后的今天终于将潘鹤雕塑园从当年的三亩地扩展到今天四十亩地的大公园。

虽然整个成长过程感觉不到父亲的“关心”,但是当到了我这个年龄,我就特别感激他,正是有他这种教育模式,才让我很自立。我现在打理父亲的个人事务,也要负担整个广州美术学院潘鹤艺术馆的投资管理运营,算是身兼多职了。

父亲一直很在乎人生经历的所有,所以,希望用艺术作品的形式去记录。相对比文学、诗词、绘画,他发现只有雕塑能够达到传播力的最大化。因为城市雕塑在公共场所的摆放,每天可以有数以万计的人去看,所以他的雕塑大都是纪念碑式的,他手中的那抔泥土成为他记录时代的载体和思想表达的出口,是他全部的“征途”。他创作的一百多座大型户外雕塑,分布在国内外68个城市,跟城市的环境融为一体,成为不同城市的形象标识,也是一个城市的精神符号。

父亲经常说:“从事艺术必须要从心而发,将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要为心灵服务,为灵魂服务。”他还认为,“作为艺术家必须要有良好的人格,人格决定了艺格。”很多人追求各种各样的表面艺术,但我父亲觉得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好的人格,人要好,要正派,你表达出来的自然就会正派。所谓人格决定艺格,人格好了艺术的高度就自然会提升。他的这些观点对我影响都很大。